

近年来考古发现的「新车」

朱华东



图3

自20世纪30年代殷墟考古首现马车实物以来,关于古代车马的研究已成为先秦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只是考古所见的绝大多数车辆,均为两轮车,通常由2马或4马牵引,于此,我们已经习以为常。不过,近年来发掘出来的实物、模型等资料表明,先秦至秦汉时期,驰骋在华夏大地的车型,恐怕还有更丰富的形态。

四轮车 秦陵西陪葬坑(QLCM1)的北墓道内发现1辆四轮独辕木车(图1),是目前首次见到的四轮车实物。该车总长7.2米,车舆宽2.6、长4.2米。车辆构件齐全,保存完整,有彩绘车盖、车舆、车轮、车衡、车轭等,所附的车轭、车舆、盖弓帽等青铜车马器一并发现,但车辆前未发现马匹。就其尺寸而言,要较普通两轮车大一倍有余,像商代的能容3人的大型马车,车舆宽度一般也就是1.2~1.7米,长1.5米左右。不过,此车仍采用了传统的单辕,而非双辕的结构。此外,发掘者根据该四轮车所在的位置(处于墓葬的主墓道内,该墓道直通墓底),以及车辆的尺寸,将该车功能推定为运输棺柩的载柩车,可备为一说。这里,姑且不论该车的具体功用,就目前材料来看,在秦代之前投入使用的四轮车就已出现。

这些材料中,最能反映秦陵四轮车与墓葬关系的,莫过于山东长岛王沟10号墓了(图2)。这座属于战国早期的单墓道大墓,整个二层台及椁顶面被营建成车辆结构,但无牵引的马匹,靠近墓道处放置车衡与车轭,四个车轮则被拆散,两两对称,摆放在靠近墓壁处,位于象征车舆的椁室的两侧。此例可更好地佐证秦陵陪葬坑四轮木车的用途。

实际使用中的四轮车,可从图像资料里找到证据。东周时期的吴越文化圈乃至是受其影响的区域,出现过一类刻纹铜器,年代大多属于战国早中期。其上的纹样并非同时代青铜器常见的装饰图案,而是以贵族实际生活的画面为主,主题涉及宴饮、弋射、田猎、采桑、战争等,图案内容丰富,诸如人物、动物、建筑、车马、船只、器用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。其中车辆的图案就曾反复出现过,既有双轮的,也有四轮的,牵引马匹数量不等,多数为骖马,但也有2马或3马拉车的图像。图像中的四轮车造型各异,出现频率最高的一种是龙舟形车辆(图3),如长岛王沟M2出土铜鉴上的图案,其车身修长,龙头龙尾上扬,车尾立长竿,上挂细条长幡,或用羽毛装饰,随风后扬。车载1~2人,1人双手持轡,另一人持羽葆在后,或作握弓持



图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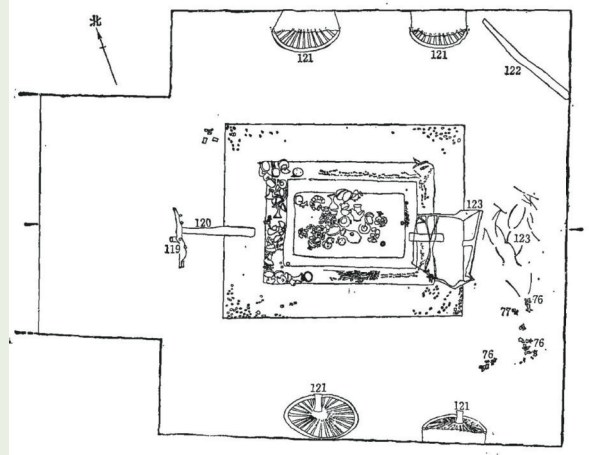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

箭状。另一种为方形车舆(图4),侧面无护栏,造型与普通二轮车相似,如上海博物馆藏刻纹铜杯,所刻四轮车上前后立3人,前者持轡,后者握长竿,中者双手似撑在一柱状物之上。第三种车舆近似平板状,四周无围栏(图5)。如淮阴高庄M1出土的算形器,车上两人,前为御者,后为箭手,车尾亦设挂有羽毛装饰的长竿。田猎则是上述三种车型所处画面的活动场景。

除了实物和图案中可见到的四轮车外,另有模型器与之相似。在甘肃礼县圆顶山M1出土过1件青铜四轮盒形器(图6),属春秋中期。该器通高8.8、长11.1、宽7.5,轮径4厘米,轮子与方盒的比例与实用车辆相似,但与实用车又有所区别,“车厢”顶部设一对开的面板,开合则由盖面四角的立鸟的旋转控制。较为奇特的是,一侧盖面中部的提手被设计成跪坐的人俑,其手臂前置,形似驾车状。

视野向西,在欧亚大陆的中西部,四轮车的实物、模型及图像则更为常见,目前能找到的实例,在距今5000年前即已出现,此段时间也是车辆出现的早期阶段,当时的牵引动物以牛为主,车辆造型也较丰富。其早期功能也或与礼仪、宗教密切相关,但比起二轮车,当然也不排除其

论齐国车马殉葬现象

于美杰



临淄东孙战国墓车马坑

字形墓葬,推测应为车马坑对应的主墓,年代在春秋中期或早期偏晚阶段。

临淄东孙车马坑 东孙墓地一号墓为一座“甲”字形土坑积石木椁墓,墓口南北长16.5米、东西宽15.3米,墓底南北长13.7~14.5米,东西宽12.5~13米,墓底距地表深4.4米。该墓北侧有一座大型车马坑,长26米左右,宽约4米。坑内殉车八辆,一字排开,马侧卧在车辆两侧。该墓葬时代属战国早期,墓主人属齐国上层贵族。

通过对齐国发现的周代车马坑进行分析,可将其特征概述如下。一是车马坑均是为大中型墓葬陪葬的,多位于主墓的上方,与墓道方向垂直。二是车马坑的大小与所属主墓的大小对应,如后李二座车马坑有大小之分,与东侧两座大墓大小分别对应。三是墓主人的等级不同,陪葬车、马的数量也有差别。如后李车马坑随葬10辆车32匹马,东孙战国墓车马坑随葬8辆车16匹马。四是从车马配置看,东孙车马坑每辆车前配两匹马,后李车马坑和陈庄车马坑有两匹马和四匹马的不同。五是车马摆放看,高青陈庄车马坑所殉车马前后纵向摆放,呈车马直立或行进的状态;后李车马坑一号坑和东孙车马坑的车呈左右成排摆放,马在车前呈侧卧摆放;后李车马坑二号坑,采用车下马上的摆放方式。

考古发现的齐国殉葬现象

考古发现的两周时期齐国车马坑主要有

三处,分别为高青陈庄殉马坑、临淄齐故城五号墓殉马坑和淄河店二号墓殉马坑。

高青陈庄殉马坑 高青陈庄遗址发现5座殉马坑,马坑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,仅存马骨架,无马具或马饰。位于M36墓道的东西两侧的两座马坑内葬8匹马,南北两排并列摆放,每排4匹,头向南。另两座马坑各葬6匹马,头亦向南,其中一号马坑平面呈长方形,直壁,平底,坑口长4.54米、宽3.7~3.8米,马分南北两排,由西向东依序摆放,前排2匹马,后排4匹马。一座坑内马骨摆放方式较特殊,六匹马两两成对放置,头向不一,在马坑的中间还放置牛角一个。一座马坑内埋马2匹,头向北。

临淄齐故城五号墓殉马坑 齐故城五号墓殉马坑分布在该墓的东、西、北三面,呈曲尺形,西面长60米;北面残长54米,复原长度75米,殉马坑全长约215米,坑宽4.8、深约2.2米。殉马数量在六百匹以上。

殉马自西南端开始,由南向北、由西而东,排成两列。马皆侧卧,头朝外,面向左,马骨上下发现席纹和乱草痕迹。除西南端五匹马颈下有小铜铃外,余皆无随葬品。齐故城五号墓南北长26.3米、宽23.35米、墓残深3.6米,斜坡状墓道残长14.7米、宽11.2~12.7米,墓主可能为春秋晚期的齐景公。

淄河店二号墓殉马坑 淄河店二号墓为一座“甲”字形墓葬,年代为战国早期,殉马坑位于该墓北侧。殉马坑呈长方形,平行于墓室分布,东西长45米、南北宽2.15~2.8米。殉马共69匹,自西向东单行排列,马头朝北,面东昂首,前肢弯曲较甚,西侧马的前腿均叠压在东侧马颈部之上,马骨下发现苇席痕迹。

通过对齐国发现的周代殉马坑进行分析,可将其特征概述如下。一是殉马坑的位置多在主墓后方,亦有位于墓道两侧者,如高青陈庄M36墓道东西两侧各有一座殉马坑。二是殉马坑规模大小不一,殉马数量差别较大。三是马成排摆放,分单排或双排布局,马下面多铺垫席子或杂草。

齐国墓葬中随葬的车

考古发现的两周时期齐国墓葬中随葬车的现象主要有三处,分别为高青陈庄M35、M36、淄河店二、三号墓和长岛王沟M10。

高青陈庄遗址 陈庄M35南北通长15.7米,墓道南北长10.5米,北端宽3.2米,南端宽2.75米。其墓道内殉车两辆,其中近墓室的整车殉葬,车衡处有殉狗,狗颈系铜铃。南端的车拆散殉葬,保存较差。陈庄M36南北通长

21.95米,墓道长15.7米,北端宽3.6米、南端宽2.2米。其墓道内随葬车两辆,均拆散殉葬,其中靠近墓室的车辆黑漆,车舆保存尚好,车轮则分别竖立倚靠于两侧墓道壁。车旁殉葬狗一条。

淄河店二、三号墓 淄河店二号墓随葬的车位于椁室东西两侧的二层台上,在塌陷的陪葬坑和椁室内也发现有陷落下来的车舆残痕,说明陪葬坑的上部和椁室上部边缘也放置车舆。这些车为独轡车,下葬时轮、舆分开放置,共清理车22辆,轮46个。淄河店三号墓随葬的车位于北二层台的中部,轮、舆拆开放置,共随葬4辆车。车轮放在墓室的北壁下,由西向东交错排列,共随葬车轮10个。

长岛王沟M10 长岛王沟M10为“甲”字形土坑竖穴墓,墓室东西6.8米、南北7.4米,深7.5米,为战国早期的齐国贵族之墓。所葬车轮、舆拆开放置,东侧二层台上有车舆和车伞朽痕,西二层台近墓道口处有车轭、车衡、四轮分置于南北两壁。

通过以上分析可知,齐国墓葬中随葬的车绝大多数为拆车葬,车、轮分置,多放置于墓室内,少量置于墓道;随葬车的数量不等,战国时期随着墓葬规模的扩大,墓内葬车数量也明显增多;所葬车轮的数量往往多于车,可能是有些车轮为备用所致。

齐国车马殉葬有着悠久的历史,早在西周中晚期就有殉马和车马殉葬的习俗。张光明先生指出,齐国有着实行殉马和车马殉葬的富足条件,这里大规模殉马、齐国国君和贵族又好马,所以出现了大规模的殉马。而墓主人的地位和财富决定了殉马坑、车马坑的规模和随葬车马的数量。如齐故城五号墓墓主为齐景公,殉马坑规模浩大,殉马达六百余匹,凸显了其作为齐国国君财富甲天下的特殊地位。而淄河店二号墓殉葬的车、马数量远远多于战国时期的中山王墓,说明战国时期车马殉葬已失去了严格的等级性,礼制逾越现象比较普遍。

齐国的葬车有两种形式,车马坑内多为整车殉葬,墓室内随葬的车绝大多数为拆散的拆葬。值得注意的是,淄河店二号墓北侧有殉马坑,二、三号墓内随葬拆散的车;高青陈庄M36墓道两侧有殉马坑,墓道内也随葬拆散的车。可见大型墓葬的殉马坑和墓内随葬车有一定的对应关系。殉马坑与墓内葬车对应如此,可能是车马坑的另一种表现形式。如此,齐故城五号墓殉马坑对应的大墓也可能随葬大量的车,可惜该墓破坏严重,已无从考证。

(作者单位:齐文化博物院)

解“马”寻“车”



图6

强大的载物、载人的天然属性,例如,有些四轮车模型甚至被做成穹窿顶房屋的样式,称其为房车也不为过。在此区域,四轮车与二轮车长期并存,这与东亚大陆的两轮车传统存在明显区别。

三轮车 一般而言,三轮车是一个相当晚近的产物,其传动技术源自二轮自行车,造型则脱胎于黄包车(一种人力二轮车),于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流行起来。不过,古代是否存在过畜力牵引的三轮车,目前尚缺少直接证据,但相似的模式器,在先秦时期确出现过。近年在四川盐源县老龙头遗址1座墓葬(M57,该墓具体年代不详,但按该遗址墓葬的分期,此墓应属于第三期,即战国至西汉早期)出土了一辆青铜三轮车模型(图7,从比例尺看,此车长不过20,高宽约10厘米),发现时车舆内有一双手持轡的青铜人俑,舆上又依次放置铜案和铜勺。此车有双辕,前置车轮的短轴则被两根轭木夹着,但较为奇特之处在于,牵引的两匹马是立于轭木之上的。在盐源青铜文化中,马的地位突出,所见出土的一类青铜枝形器,其顶端常见对立的双马形态,被认为是古代印欧语系中的“双马神”崇拜,其形象广泛存在于新疆、甘肃、内蒙古、青海等西北地区青铜时代遗址、遗迹之上。

另一件器物为青铜三轮盘(图8),1958年江苏武进淹城遗址出土,通高15.8、盘径26厘米。盘为春秋晚期常见样式,盘下原本应该是足部的位置,却装配了三只小轮,有短车轴与之连接,三轮皆可转动。出土时盘倒扣在1件牺首簋之上,簋下则是一件常见的三足缶。两只顾首龙形兽则立于前轮两侧的车轴之上。上述两件三轮铜器模型,在摆放特征、牵引动物的位置等方面有较多相似之处。其中将马置于车轴之上,而非贴近地面,反映出较浓厚的象征意味。

丹麦出土的青铜太阳车(Trundholm sun chariot)就是这种象征的典型代表。该车总长54、宽29厘米。单马立于四个轮子的横轴之上,一块鎏金的圆盘侧立于其后拖拽的两轮之间,象征着太阳。其年代为公元前1100~550年。此马车的造型大约可与北欧神话对应,日神“达戈”(Dagr)和夜神诺特(Nott)分掌昼夜,其所乘车辆由一匹名叫“斯基菲克西”的马(Skinfaxi,意为“光之马”)牵引,当日神的战车穿越天际之时,大地则进入白天。而上述两辆三轮车模型的设计初衷应该也有自己的隐喻尚待发掘。

(作者单位:安徽大学历史学院)



图5



图4

齐国是两周时期的诸侯强国,以其经济、科技、文化和军事实力称雄四面八方。在齐国故都临淄,地面至今仍保存有数量众多的墓冢,这些多是齐国王公贵族的坟墓。他们在地下开挖大而深的墓室,上面夯筑高大的封土。为了凸显墓主身份地位,有些墓葬在墓室或墓道里葬车,或在墓葬附近建造附属的殉马坑或车马坑。本文从车马坑、殉马坑、墓内葬车三方面对齐国车、马殉葬现象进行分析,归纳其形制布局和埋葬规律,并进一步探讨齐国车马埋葬制度及其反映的齐国历史。

考古发现的齐国车马坑

考古发现的两周时期齐国车马坑主要有三处,分别为高青陈庄车马坑、临淄后李车马坑和临淄东孙车马坑。

高青陈庄车马坑 陈庄遗址两座“甲”字形大墓发现车马坑一座,年代为西周中期。车马坑平面呈长方形,土坑竖穴,上口南北长14.15米、东西宽3.4米,下口南北长13.9米、宽3.3米,坑深4.2~4.9米。坑内放置三辆车,前中后成列摆放,车轡均向东南,车前均驾马,马骨直立跪状,呈拉车前行状,发现有铜车马饰件。坑内挖有轮槽、轴槽和马槽,以保持车的稳固和车的姿态。

临淄后李车马坑 在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后李官村发现二座车马坑,位于主墓的后方,平面呈不规则的长方形。其中一号车马坑南北长31米、东西宽3.6~4米、深1.2~1.7米,坑内殉10辆车,32匹马。车马由南向北摆成一排。车可分为两类:一类为战车,其特点是车舆较小,由纵横圆木构成网格状,涂以红漆,车轮较小;另一类为辎重车,车舆为战车的2~2.5倍,车轮较大。马均头向西,面向南,整齐的摆放在所属车马坑的前面,每车配马四匹或二匹,并发现车马饰件。

二号车马坑与一号车马坑紧邻,但规模较小,南北长7.6米、东西宽3米、深2.1米,坑内殉有6匹马,所殉车在马骨架下方。为完整的保存马骨,没有对车进行清理。在一号车马坑的东北约10米处,发现两座同时期的“甲”